

周起元：以廉惠称 仁义忠信

黄静芬



周起元画像

明朝末期，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周起元、高攀龙、周顺昌、周宗建、李应升、黄尊素、缪昌期七人，除高攀龙投水自沉外，皆惨烈死于狱中酷刑。他们在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斗争中，以一腔热血、忠肝义胆、九死不悔，谱写了一曲彪炳史册的慷慨悲歌。史称他们为“东林后七君子”。

“东林后七君子”之一的周起元（1571—1626年），字仲先，号绵贞，明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出生于海澄县三都金沙衙里社（今厦门市海沧区后井村）。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，中乡试解元，翌年中进士，授江西浮梁（今江西省景德镇市）知县，擢任南昌知府、湖广道御史、陕西巡抚等职，官至太仆少卿。

周起元为官的一生，是清正廉明、为民请命、体恤百姓、深受百姓爱戴的一生。《明史·周起元传》曰：“周起元，字仲先，海澄人。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，明年成进士。历知浮梁、南昌，以廉惠称。”周起元去世后，明朝大学士黄道周为他撰写墓志铭，有“兰香自烧，膏明自焚”“行仁义，蹈忠信”等句。

撰写《东西洋考·序》与修建圭屿塔

在史学上，15—17世纪被认为是大航海时代，是欧洲人认识东方、东方人认识西洋，彼此之间进行经贸文化交

流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。周起元所处的时代，正是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初期。

周起元出生于临海而居、以海为生的厦门海沧后井村。彼时的海沧，有一家金沙书院，是同安理学大儒林希元于 1549 年开办，目的在于传播儒学。

嘉靖年间，一幅表现中国历史地理与海外形势关系的《古今形胜之图》横空出世。这幅地图的原作者是江西进士喻时，最初刊刻于“信丰北宫”。原图纵 115 厘米，横 100 厘米，木刻墨印着色；设色精致，分别用赭黄、绿蓝、青蓝三色普染图上的黄河、江湖海洋和高山峻岭；两侧有说明文字记载图幅范围及当时所设府、州、县、卫、所等建置数目；图中标注地名近千处，京城、省府名套双线方框，州名及一些重要地名套单线框，“今”（明代）地名用阳文，“古”（明代以前）地名用阴文区别表示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 年），周起元的祖父周一阳协助林希元重新刊刻《古今形胜之图》，收录于金沙书院内，其目的不仅在于“欲便于学者览史，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”，更在于开阔学生的视野，让学生在读圣贤书的同时，兼顾史地知识的学习。

《古今形胜之图》是一幅相当粗略的中国地图，其质量远比不上当时官府掌握的《广舆图》。但这幅地图，从喻时的初次刻图，到林希元在海沧金沙书院重刻，后来由闽南商人将其带到菲律宾，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基多·

拉维查理士得到了金沙书院重刻版的《古今形胜之图》，随后将之送到欧洲。

一幅地图，辗转多地多国，成为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一张传入欧洲的中国全图，其所载的文化信息，使欧洲人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。可以说，这幅地图承载了不可估量的深厚意义和历史价值，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
周起元的童年时期，金沙书院重刻《古今形胜之图》已有近20年，在海洋文化的传播上已经算是“成熟”的书院。周起元便是在这样的一所书院里，接受了启蒙教育。

童年的周起元，一次又一次站在“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”的地图前，端详地图上的地形地貌、山川河流，浸淫于海洋文化之中。他的眼界，不知不觉得以开阔，海洋文化的烙印，不知不觉镌刻进他的心里。

明初时，因倭寇和海盗猖獗，朝廷以海禁为国策，直至明末，绵延数百年的海禁政策，使沿海百姓出海捕鱼谋生面临着官府围剿和海盗突袭的危险。面对浩瀚大海，沐浴天风海涛，“开放海禁，促进海上贸易”这一意识，在周起元心里，一点一点萌芽、一点一点成长，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

初入仕途，周起元与一批漳州出身的士大夫组成佺云诗社，他们志同道合，吟诗作赋之余，关注国家命运与百

姓生计。诗社成员中，有周起元的好友张燮。彼时，张燮受海澄知县陶镛和漳州府司理萧基、督饷别驾王起宗的委托，着手撰写《东西洋考》，作为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。

《东西洋考》成书后，共12卷，收录了明代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各国历史、地理知识，记载了东西洋40国概况及各种航海知识，是一本洋洋巨著。

周起元为好友喝彩，为《东西洋考》作序。在序言中，他概述了汉唐以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史迹，阐明了自己对开放海禁、发展海澄一带航运业、造福百姓的观点，将对海洋文化、海洋经济的远见卓识，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出来。

他写道：“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，于是五方之贾，熙熙水国，舳舻腥，分市东西路。”他指出：“四夷产宝，中土产文。”他的观点，完全摒弃了传统知识分子轻商业、轻贸易的理念。他认为，海洋经济得以合法化，不仅利于民生，而且能成为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，“殆其为天子之南库也”，相当于是朝廷设在南方的一个金库。此时，周起元已然意识到开发海洋的最重要意义——经国阜财、固圉强边，即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。

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《东西洋考》即将付梓。时任广西参议、回乡省亲的周起元和张燮一同考察月港，度量圭屿地势，筹划在圭屿上建塔。周起元认为，“江开

两岸，建塔中流，当使潮音虚塔，水月澄鲜”，一座高塔伫立在圭屿岛上，亦可“砥柱狂澜，撑持地轴”。于是，周起元和张燮合力发出《圭屿建塔募捐书》，号召民众为建塔献金。

圭屿岛其“状如龟浮波面”，故名“龟屿”。随之雅化，成为“圭屿”。方言之中，“圭”与“鸡”谐音，遂又俗化为“鸡屿”。圭屿岛溯流而上，即是当年的月港。明代以来，海上贸易兴起，月港为重要商埠，圭屿岛便是东西洋商船出入月港的必经之地。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，明朝政府在岛上设置“盘验”，稽查海上来往船只，征收海舶贸易税收。《海澄县志》称圭屿岛“屹立海中，为全漳门户”，《厦门志》称其“屹立海中，为厦岛之内臂、漳郡之外户”。

圭屿塔在众人的支持下很快完工。《海澄县志》载：“此塔不仅关阖邑形胜，实赖补全郡东北之虚。”圭屿塔建成后，一跃成为往来商船和渔民的坐标，成为海洋丝绸之路的前哨，成为一颗璀璨的海洋明珠。

圭屿塔于近代坍塌毁去，但它留下的历史印记、昭示的历史意义，至今依然深远重大。而周起元，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洞察思索，以卓识远见和精辟论述，当之无愧地被今人称为“闽南海洋文化的先驱”。

重建双溪书院与《参税珰高宗疏》直言弹劾

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 年），周起元乡试第一，次年中进士。随后，他出任浮梁知县。

浮梁，宋属饶州，今江西省景德镇。此地人杰地灵，历代兴办书院之风颇盛。

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，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、研究学问的场所。书院之设，始于唐，兴于宋元，发展于明清。据考，浮梁最早的书院是创办于南宋初期的新田书院。元至元十七年（1280 年），位于浮梁县北关莲荷塘的双溪书院华丽出现，因建堂于双溪之上而得名，书院有礼殿、敬简堂 12 间。明初，双溪书院被毁。

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 年），知县周起元本着“人才是兴国之本、富民之基、发展之源”的理念，按志载图，重建双溪书院。

重建的双溪书院占地约 260 亩，前有范仲淹任职饶州期间巡行浮梁县时倡议开挖的 47 亩莲荷塘，塘内广种白莲，建有“聚奎桥”。双溪书院兴盛时期，知名学者、理学家吴迁、胡云龙、黄龙光、杨维翰、王学古、黄士俊等都曾于双溪书院主讲过。明天启五年（1625 年），阉人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，诏毁天下书院，双溪书院及浮梁其他

书院皆被毁。但双溪书院作为彼时重要文化摇篮的地位，一直不曾动摇。

任浮梁知县几年后，周起元被调任南昌知府。因政绩斐然，逐渐受到朝廷重用。此后，周起元历任湖广道御史、陕西巡抚、广西参议等职。每到一处，周起元皆急民众之所急，想民众之所想，倾力造福民众，受到各地民众的拥戴。

官越当越大，但周起元的生活依然极其俭朴。他刚上任江南巡抚时，时任光禄寺丞的同乡涂一榛返乡省亲，路过周起元任职的苏州，便到官衙相访。临别时，周起元交代说，他的妻子要到苏州与他团聚，若路上遇见了，叫她在杭州帮他制了夏衣带来。涂一榛不解地问：“为何不在当地购置夏衣？”周起元解释说，刚上任，万万不可向所属部门购买，以免下属官员以此为由送礼，所以让家眷从别处购置衣物。

周起元“丝粟无所取”的清明廉洁精神，不仅让同乡无比感慨，也获得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誉。

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，周起元选授御史赴京待命。时值朝廷考核京官，这是关系官员升迁降黜的大事，是党争的焦点。周起元正值京察之际来京，以他的为人和影响，势在必然地被卷入党争的漩涡。无奈中，周起元在京待命达两年之久，一直到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才授命为御史。

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，朝廷派太监高宥管征福建工商各税，高宥看中海澄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，便于每年冬天商船回航时，带着他的卫队来海澄，对商船进行检查，以进贡皇帝为名，强索进口的珍宝和贵重物品。百姓向地方官控告，高宥就派人杀死检举者20多人，放火烧毁30多户人家的住房，民众群情激起，包围了高宥设在月港的官衙。地方官怕事态扩大，加以制止，百姓只得含冤解散。而高宥，竟然埋怨地方官镇压不力，于翌日率领他的卫队驰回省城，威胁巡抚袁一驥必须惩办地方官。省里官员都不屈服，调动武力对抗，并由巡抚、巡按、按察使联名，上疏报告朝廷。

太监高宥的种种恶行，导致了贸易境况恶化，市场凋敝，引发了沿海百姓暴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家乡相续传来高宥“横征海舶洋货，胁官吏，烧杀市民”的种种罪行，让身在外省任御史的周起元拍案而起。他挺身而出，参与了对贪官的斗争。他直言弹劾，为民请命，奋笔疾书《参税珰高宥疏》，历数高宥驻闽之斑斑劣迹，开篇曰：“湖广道监察御史周起元题为税监剥民措价、戕杀生命、要挟重臣，乞大奋乾刚，速行正法，以存国纪，以安地方事。”他说：“从来税监最贪、最狠、最毒。”提请皇帝将高宥“速行正法以存国纪，以安地方”。同时还从“民为邦本”出发，提醒皇帝：“臣恐防川不决，决必滔天；宿火不发，发必燎原……皇上岂善为社稷计乎？”

最终，高寀被召回京，“瘟神”灰溜溜地离开了福建。

天启三年（1623 年），周起元被召为太仆少卿。彼时，刑部侍郎邹元标和左都御史冯从吾创办了首善书院，书院地处周起元的巡抚域内，周起元自然时常造访书院。由于书院传播道学，时常议论朝政，兵部给事中朱童蒙便上疏请求禁止，并诋毁道学为“伪学”。周起元一向尊崇程朱理学，容不得有人诋毁，便上疏为书院辩解。最终，朱童蒙被贬为苏松分守参政。

朱童蒙离开京师后更加骄横，“每行道辄鞭扑数十人，血肉狼藉”。又曾非法击毙漕卒，百姓恨之入骨。周起元得到百姓控诉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天子命我抚民察吏，可坐视此等虐吾民耶？”于是，他继续上疏弹劾。结果，朱童蒙投奔到魏忠贤门下，被调回京师，升官为太常寺卿。

天启四年（1624 年），周起元被任命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江南苏松。当时在吴中地区督管织造的太监李实依仗阉党为后盾，诬告不依附巴结他的下属官员，周起元三次上疏解救被诬陷的官员。李实见未能得逞，又以上供为名，在原有税赋外要求吴中百姓上缴 10 余万银两。他贪横无忌的恶行让吴中民怨沸腾。周起元不忍民众疾苦，写《去蠹七事疏》，上疏指控李实罪状，引起李实的靠山魏忠贤的嫉恨。

不久，魏忠贤便矫旨削去了周起元的官籍。惹下杀身之祸的周起元只得整装归里，“吴人无老少不皆随送，涕

哭声塞市”。时人赞扬周起元“公去而名益高矣”！

“冤而贫” 忠廉尽节与“行仁义” 祠祀忠愍

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，万历皇帝懒于政事，天启皇帝荒嬉无度，朝政逐渐落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手中。

周起元因多次弹劾揭露阉党恶行，始终不肯与阉党同流合污，被魏忠贤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

尽管周起元已被削籍归里，但阉党仍欲置他于死地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二月，魏忠贤命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弹劾周起元借讲学为名，与高攀龙、周顺昌等“朋比为奸、讥讽朝政”。又取来有李实盖印的空白奏疏，令李永员、李朝钦填写，诬告周起元为巡抚时，阻拦上缴赋税，贪污十余万金。周起元因此被锦衣卫从家中逮捕进京。

据《漳州府志》记载，锦衣卫至，士民大惊，传闻退赃即可赎身，家乡父老在四城门设下木柜，号召民众投钱救人。不到数日，便筹满钱款。民众将钱款如数交给锦衣卫，并哭诉周中丞“冤而贫”，希望押解的锦衣卫能给予方便，善待他。

周起元被押解进京，落在都指挥僉事许显纯手中。许显纯“略晓文墨，性残酷”，杨涟等十余人皆死于其手。史志记载，周起元身受严刑，屈打成招。然而，《明史·许显纯传》说：杨涟、左光斗等十余人供状，“皆显纯自

为之”。那么，周起元的供状，或许也是许显纯伪造。

周起元于狱中寄回家书，家书上写道：“吾仕宦二十余年，只有山田数十亩可供祭祀，所购吴中卷籍颇多，可捡卖为糊口费也。”寥寥几言，足见周起元为官之清正廉明。

天启六年（1626 年）九月，周起元因被施于酷刑，肌肉糜烂致死，享年 54 岁。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历史并未忘记周起元这位体恤百姓的好官。崇祯元年（1628 年），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，着手惩办魏忠贤及其阉党，受魏忠贤迫害的冤案纷纷得到平反，周起元也始得昭雪，被迫赠为兵部侍郎衔，谥忠愍，赐祭葬，运棺回乡，葬于漳州西门外西渡头，建祠特祀于漳州府学之西。



周起元宗祠

明朝大学士黄道周《送周中丞还里》诗云：“沉痛江山骨，昭回云汉恩。青蝇宾客尽，石鸟规摹存。杂木怜华表，二招反夏门。欲裁南史简，挥涕诵遗言。”黄道周为周起元撰写墓志铭，盛赞周起元：“夫子之淳兮，不为茅以罇兮。夫子之庄兮，不艾人自芳兮。夫子之虚兮，退与道居兮。夫子之善兮，莫胜说兮，莫之敢撓日食月兮。袞兮钺兮，兰春秋允不謁兮。”洋洋千言中，有“兰香自烧，膏明自焚”“行仁义，蹈忠信”等句，这是概括周起元一生的最好写照。